

因为晚清时盛泽镇的织机多于苏州城。其实盛泽镇的织机,都是简单的小型织机,所织多是平绸,只要织匠一人即可操作,而苏州城的织机是花楼机,织造高档缎匹,每台织机需要织工二至三人方可操作,仅从织机的构造就可知道,苏州城的丝绸织造水平远在盛泽镇之上,而断不会得出相反结论。也就是说,不能仅凭织机的数量,就来比较两地丝绸技术水平的高低。再如有人研究鸦片战争后清代苏州丝织业账房的发展,依据民国二年

(1913)实业司的调查统计材料,计算出战前战后各开设了多少家账房后进而认为,“战后67年与战前138年相比,‘账房’数量由11家增为57家,增长4.2倍”。事实上,调查材料只是反映,调查时尚有账房57家,其中开设于鸦片战争前的为11家,而不是说,战前总共开设了11家,不能将11家与46家来作简单类比。至于鸦片战争前真正开设了多少家账房,是难以知道的。这是研究者作了不恰当的比较,自然难以取信。

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

常建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近些年来,海内外的社会史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寻求着某种突破。有如下研究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

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

*收稿日期:2013-12-04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男,河北张家口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明清史。

引用格式:常建华.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08-010.

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性行为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台湾学术界有效开展了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的探讨。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6]5.《导言》}。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所举办的“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类书大全、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吴智和教授带领的明史研究小组探讨明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

台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代表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本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

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消费生活取得的进展引人注目,巫仁恕教授《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提出晚明时期已经形成“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础上的,巫仁恕最新著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作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二者有一定的共生性,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其突破点概括起来就是从生活史推究背后的形成逻辑,并思考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王鸿泰先生谈到物质文化消费与大众文化特别是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细节上去看,具体地观察各种不同的“物”,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流传?经历了什么样的流通过程?如何进入个人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再考察有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个物的世界?同时,推论人与物的互动,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人际网络?”^{[7]352}日常生活史研究需要认识“物”,借鉴多学科知识与方法非常有必要。

中国大陆最近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宋书所论明清江南居民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影响意义,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给人印象深刻;周书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论述的对象主要指从事虚文的“词章家”一类,或者说在经济上,不靠制度保障而以文作为谋生工具、自求生路的人,揭示出诗文如何谋生以及文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体现的诸色人等是活生生的,借助物质消费才可以进入日常的生活状态,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探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史不可分离。历史人

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日常生活史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出发点,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欧美学术界诸多重要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8]¹³²⁻¹³³这是具有浓烈新文化史色彩的论述。

历史人类学也与地域社会史有不解之缘。明清社会史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地域社会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9]

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10]³⁵⁸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

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可见,历史人类学重视地域、从生活出发的研究取向,是社会史研究十分需要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其次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等纳入视野;最后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史展示出美好的学术前途。

参考文献:

- [1] 于尔根·科卡.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J]. 景德祥,译. 史学理论研究,2007,(1):58-65.
- [2] 彭慕兰. 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M]//杰里·H,主编. 全球史读本. 夏继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3] 张瑞威. 一条鞭法的开端: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J]. (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 明史研究,2007,(10).
- [4] 万明. 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M]//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5] 赵世瑜. 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63-74.
- [6] 蒲慕州. 生活与文化[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 [7] 王鸿泰. 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台湾二十年来新史学的发展[M]//江南社会历史评论(4).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8] 斯特凡·约尔丹. 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9] 徐桂兰.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27-32.
- [10] 刘平,等. 区域研究·地方文献·学术路径——“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纪要[M]//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0).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